

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



北京出版史志

宣部出版局设置沿革及人员变迁

京地区马列著作出版概述

文志·经籍志·出版志

代的北京刻书

北京方志的编纂与出版(中)

话北京古籍

第2辑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 SHIZHI

0239.191

09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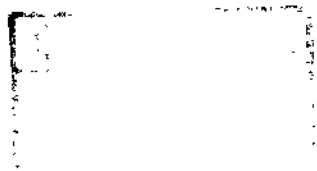
200182970

北京出版史志

第二辑

《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

DJ32/22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史志
BEI JING CHU BAN SHI ZHI
第二辑
《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76 000字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
ISBN 7-200-02371-x/K·244
定 价: 5.40元

目 录

- 中宣部出版局设置沿革及人员变迁……………许力以(1)
- 北京地区马列著作出版概述……………曹鹤龙(8)

- 艺文志·经籍志·出版志……………田耕(22)
- 北京方志的编纂与出版(中)……………姜纬堂(31)
- 北京古代的书……………齐心(60)
- 北京辖区沿革略述……………陈培荣(73)

●燕京出版史事●

- 金代的北京刻书……………李致忠(78)
- 应县木塔发现的北京最早印刷品……………郑恩淮(92)
- 史坛缤纷一枝花……………叶祖孚(122)
- 从《新青年》到《每周评论》
陈独秀在北京的办刊活动……………杨维新(126)
- 清代北京“坊刻本”书录……………杜信孚(133)

●古书钩沉●

- 首都图书馆馆藏古籍简述……………阎中英(153)
- 散佚宋版《经典释文》收归……………
国立故宫博物院前后……………滕振才(158)

●京华出版苑●

- 漫话北京古籍……………赵 洛(160)
中国营造学社及其出版物……………单家筠(170)
建国前北京地区出版单位举要(一)……………
……………马立水 高 健(172)
《北京出版志》参考书目……………雷梦水(191)
-

●名人与出版●

- 出版名人传略……………马 力 高戈平(197)
-

●书肆记趣●

- 清代以来北京书业要览……………宗 时(202)
-

●图书市场管理●

- 再说“正名”……………黄亚昌(212)
-

●出版单位介绍●

- 人民出版社简介……………杨寿松 武凤兰整理(214)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简介……………武凤兰整理(220)
-

●出版大事年表●

- 北京出版系统大事记……………潘庆海(224)
-

●答读者问●

- 以纸代简……………李致忠(229)
-

●动态●

- 北京新闻出版志编委会召开篇目研讨会……………(190)

●资料●

雕版(21)	聚书地(121)	四库全书(125)
简策(132)	帛书(171)	乾隆禁书(201)
北京著作权问题之“最”(211)		监本(219)
我国书籍的世界之“最”(213)		荣宝斋(228)



中宣部出版局设置沿革及人员 变迁

许力以

全国解放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0年建立了出版处，与出版处差不多同时或前后建立的有宣传处、理论处、教育处、科学处、文艺处、电影处、国际宣传处及党史研究室等。当时各局均称为处，一直延伸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以前。中共中央各部都是这样称谓。

中宣部出版处，最初称为新闻出版处，既管出版又管新闻。1953年全国大行政区和各中央局撤销，中央宣传部从各中央局宣传部调来大批干部，此时中宣部增加设置诸多处，如高教处、体育卫生处、地方工作室等，新闻出版处分立为报纸处与出版处。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宣部各处的设置时有变动，1957年出版处与报纸处又合并为新闻出版处，到了1960年将报纸方面的工作划归宣传处管理，新闻出版处又称出版处，专门负责图书期刊出版方面的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所谓捣毁“阎王殿”，中宣部无形中撤销，各处室不复存在，干部都到宁夏贺兰山，组成干校，一面劳动，一面搞运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中宣部正式恢复，同时设置各局，包括出版局。恢复后的中宣部将处称为局，中共中央各部的体制亦如是。

中宣部出版处的地址，随中宣部本部，初时都在中南海内。出版处具体地址是在中南海迎春堂院内。迎春堂在中南海中区，在东边，出门就面临中南海的湖水，院内外花木繁茂，春天，到处都是鲜艳的花朵。迎春堂北边一百多米处，是中南海露天游泳池和毛主席的室内游泳池。迎春堂西边几十米处，就是怀仁堂。

1957年中宣部在沙滩原北大广场内修建了一座办公楼，随即从中南海迁到沙滩办公。出版处设在楼内三层东边。“文革”以后，恢复的中宣部，各局室都在钓鱼台办公，后中宣部又迁入中南海内，不久又迁到和平门南新华街甲一号和西长安街六号。出版局与文艺局、教育局同在西长安街六号，后此地因改建大楼，出版局又迁至南新华街，与中宣部总部一起办公。

中宣部出版处从1950年到1966年“文革”前，处长一直是包之静同志。1952年包一度兼任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因无暇兼顾，出版处处长暂由黎澍同志代理过一小段时间。“文革”前先后担任过出版处副处长的，有袁新、陈笑雨、王谟、许力以等同志。包之静同志是一位忠厚的长者，他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精通业务，懂法、英、俄文。他是1912年出生，苏州人，上海大学生。在1931年抗日洪流中参加共青团。1938年由党组织调派到解放区，加入新四军的队伍。在解放区一直主持报社的工作，曾与范长江同志一起负责华中《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以后转战到山东，担任《大众日报》社社长，1950年从《大众日报》社调至中宣部，1964年还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建国后的出版工作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可惜的是他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损伤，不幸于1971年病逝于宁夏。

上面说及代理出版处处长的黎澍同志，解放前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在中宣部时主持党史研究室，以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近代史所所长，并担任《历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

杂志的主编，后因病不治去世。担任过副处长的袁靳同志，来中宣部以前为华北局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后平反，调云南工作，曾在昆明市委担任领导职务。副处长陈笑雨同志（笔名马铁丁），为著名杂文作家，五十年代末调至人民日报社，主编文艺副刊，“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后平反昭雪。副处长王谟，曾任西北局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后因报纸业务划归宣传处，调至宣传处任副处长。副处长许力以，解放前在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后进中央马列学院，从马列学院调入中宣部。

“文革”后重新恢复的中宣部，出版局长为边春光同志，他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革”后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由陕西调到中宣部，以后又从中宣部调到文化部，担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出版局局长，后为国家出版局局长。1982年国家机构调整，国家出版局撤销，出版工作归文化部，成立文化部出版局，边春光同志调来主持其工作；原国家出版局副局长许力以，调回中宣部任出版局局长。边春光同志1989年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职务，许力以离休退下后，由副局长伍杰同志继任，当时副局长还有袁亮同志，袁以后调到新闻出版署出版科学研究所担任所长。伍杰同志后来调到中宣部干部局担任局长。继伍杰同志担任出版局局长的是刘国雄同志，后来刘改任中宣部学习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之后，出版局长为高明光，副局长为宋镇铃、郭书林同志。

中宣部出版局初时只有三、四个干部，到六十年代，最多时也不超过十人。“文革”前中宣部各处不设科，“文革”后因业务扩大，出版局干部有十六七人，局下设若干处。

中宣部出版局的工作，在五十年代主要由胡乔木同志分管，后来胡乔木同志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后，还不时过问出版工作。“文革”前分管出版工作的副部长，有张磐石同志，他来

中宣部之前是华北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解放前就负责新闻工作；李卓然同志也分管过一段出版工作，他来中宣部之前是东北行政区的副主席兼东北局宣传部长；六十年代初周扬同志分管出版工作，以后又由林默涵同志分管。陆定一同志全面负责宣传文教工作，但经常过问出版工作，遇有重要问题，还直接处理。“文革”以后，耿飚、张平化、王任重同志曾先后管过宣传工作，对出版工作都很关注。胡耀邦同志担任宣传部长期间，经常听取出版方面的工作汇报，时有指示。八十年代末，廖井丹同志调来中宣部担任副部长以后，一直分管出版工作，直至他从领导岗位离退下来。以后曾分管过出版工作的副部长有李彦、翟泰丰、徐惟诚、龚心翰等诸同志。邓力群同志担任中宣部部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很重视出版工作，有许多批示，并亲自主持起草中央为出版工作发布的指示和文件。王忍之同志也很关注出版工作，在他担任宣传部长期间和调离宣传部长岗位以后，一直担任《中国美术分类全集》400卷这一大型图书的领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从五十年代初以来，出版局作为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部门，直接参与出版方面的领导工作。出版局主要的工作是：1. 监督出版战线对党的路线与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2. 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向上反映情况；3. 代中央宣传部与中共中央起草有关出版方面的文件；4. 与国家行政部门（如前后与出版总署、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署）经常接触，对重大问题进行商酌；5. 处理中共中央和部领导交办的事宜，交办的事是很多的。

出版局日常的工作，要与出版社、杂志社的领导与编辑取得密切联系，包括与发行部门与印刷部门的干部取得密切联系，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与问题。特别是平日要翻阅全国出版的图书和杂志，着重阅读涉及政治、理论及政策性的书刊文章。还经常召开座谈会，邀请有关方面的同志前来讨论各种问题，

包括针对书刊中某个方面的内容、作家与学者们对出版工作的意见、读者的志趣与要求,还有些涉及具体政策性的问题,如通过座谈征求对稿酬的意见,对税收和财政上交制度的意见等。发行工作中的问题与印刷发行中的问题,也是座谈会与议论中的重点。

中宣部出版局从五十年代以来,密切注视与思考出版战线出现的重大问题,对理论界和知识界涉及言论出版问题,加以关注,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书面汇报、报告,或在中宣部部长每周定期的办公会议上作口头汇报。例如1958到1959年“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影响到出版部门,出版社片面追求出书数量,社会上出现人人做诗,出版社把若干粗制滥造的诗篇随意汇集出版;有的将几张夸夸其谈、言不由衷的大字报,汇集成书。剪刀糍糊搞起来的东西很多,书籍质量大大下降。针对此种情况,中宣部出版局组织了调查,搜集了大批材料,向部领导作了汇报,并写成《关于改进书籍出版工作和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报告》,由中宣部发到各地,纠正了这种出书乱编滥出的现象,很快扭转了局面。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林彪刮起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的歪风,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不去理解时代背景与社会实际,而是提倡所谓实用主义,生搬硬套,到处贴标签。中宣部领导指定由出版局进行调查研究,写出报告。出版局查阅了当时报刊图书中出现的大量材料,其中有不少是所谓的学习心得,将把人们的学习引进死胡同,思想会越来越简单、机械,不但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反而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此事由包之静同志主持写成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宣传一些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经中宣部办公会议多次讨论修改,于1961年3月由中央批转全党。不幸此一报告成为“文革”中的重

大事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此大作文章，把这一文件作为中宣部所谓“阎王殿”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罪证。中宣部部长们不但为此受迫害，执笔人包之静更受到严重的打击，与此牵连的同志亦不能幸免。此一报告本是一件好事，在“文革”年代，却成为重大罪责，是非颠倒竟至于此。

中宣部出版局从五十年代起，参与制定重要的出书规划。如《毛泽东选集》、《干部必读》和马恩列斯全集的出版、印刷与发行的计划。还参与制定重点的学术与文学的出书规划。如1956年参与制定《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1956—1968年）规划》，这个规划包括翻译出版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与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等世界古今名著1600多种；参与制定中国古籍整理规划及出版外国文学名著规划，如《1956—1963年世界文学名著千种翻译规划》。这些规划当时已开始实施，但是由于后来极左思潮逐渐占了上风，规划不断受阻。出版局还直接组织出版外国政治学术著作，这主要是内部参考书，当时称为“灰皮书”。为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出版局还具体领导编辑《孙中山全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出版《蒋介石全集》，为出版《蒋介石全集》，曾代部起草了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报告，记得报告中建议印一万册，毛主席批示印二万册。这一计划已开始进行，由有关出版社搜集资料，后因“文化大革命”爆发，停止编辑工作。

中共中央、中央宣传部有关出版方面的指示、规定，以及批转国家主管部门的文件，大多都由中宣部出版局起草或参与起草。文件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出版机构的设置、图书的发行与处理、书刊内容的保密制度、中央文件与中央领导同志著作的出版等。有时还涉及某一重点出版社与期刊的建立与创办。一些重大问题，并非思想意识方面，也列入议程。例如纸张的供应，五十年代末“大跃进”以后的困难时期，纸张十分紧张，

为了保证学生课本和重点书刊及报纸的用纸，出版处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向上级汇报。陆定一同志十分关心此事，亲自过问，中宣部出版处协同文化部提出分配与压缩用纸的报告，经陆定一同志审定。在1961年10月15日《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课本图书报刊用纸问题的报告》中，中央批语还规定了用纸的控制与审批办法。

1978年以后重新恢复的中宣部出版局，也参与出版方面的领导工作。作为中宣部的一个职能部门和部领导的助手，出版局经常进行调查研究，对重要问题提出报告，直接或间接参与起草有关文件。例如在邓力群同志亲自主持下，组织有关同志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1983年6月6日发出），这一文件在出版方面成为纲领性的文件。在引导出版工作走向正确的方向，纠正一些偏向如出现粗制滥造、出版淫秽、黄色的作品等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对于一些重点图书的出版规划，一直加以关注，有的直接掌握。在加强对出版物的监督，开展书评方面，包括创办书评刊物等，作了许多工作。同时还经常按照中共中央、中宣部领导的意图撰写重要评论。

中宣部出版局自五十年代初建立至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中间经过“文革”的波涛。综观这四十多年，出版局的确做了不少事情，成绩是肯定的。由于宣传部的领导对出版工作特别关注，出版局的领导也经常接触部长及中央主管思想工作的领导同志，过去驻地又曾在中南海、钓鱼台，与中央首脑机关驻地相邻，同上级接触方便，信息较灵，了解中央与中宣部领导的意图较快，工作较顺当。但在“文革”以前一段时间内，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出版局的工作也有不少过失，对问题处理不当，甚至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这些经验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北京地区马列著作出版概述

曹鹤龙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基础。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五四”以来，北京是传播和出版马列著作的重要地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成为传播和出版马列著作的中心。北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普及并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下面对北京地区马列著作出版情况，分为五个阶段作一概括叙述：

一、“五四”时期

根据目前查到的文献，北京地区最早发表马列著作，可追溯到1919年4月。“五四”时期，即从1919年4月到1920年11月，先后在《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新青年》、《解放与改造》、《国民》、《新中国》、《曙

《光等报刊上发表有关马列著作的中译文12篇,其中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文7篇,关于列宁著作的中译文5篇。

1919年4月6日,由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第16号上,开辟“名著介绍”专栏,发表《共产党的宣言》一文,约千余字,摘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第2章十项革命措施,署名舍译,译文前加的编者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大的意见,……其要旨是主张阶级斗争,要求各地劳动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这篇译文突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这是目前发现的在北京地区最早发表的一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文。

1919年2月,《晨报》副刊进行改组,开设“自由论坛”、“译丛”两个专栏,李大钊应邀参加副刊的编辑工作。同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又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两篇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文。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在1919年5月5日至8日发表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渊泉翻译,文中摘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若干重要段落。同年5月9日到6月1日发表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食力译,从日文转译,全文译出。这是目前发现的在我国最早发表全文翻译的马克思著作中译文。

《新青年》在我国新文化运动史上起着重要作用,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根据《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基本内容,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系统、比较详细的介绍,在介绍唯物史观时直接援引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重要段落,这些片断从日文转译,其中《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两段

译文是第一次译成中文。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李大钊的帮助下,《国民》杂志也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是在第2卷第1号、第3号上分别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三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摘译《共产党宣言》第1章,李泽彰译。据许德珩回忆,译者已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完,计划在《国民》杂志上分期发表。但在第1章译文刊完后,由于胡适的干涉,译者撤回译稿,未能全文刊出。《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翻译《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费觉天译。《马克思历史的唯物主义》,摘译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信中的两段话,常乃真译。这是目前发现的这两篇著作的最早中译文。

在《解放与改造》杂志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一文,金倡琴译。在《新中国》杂志第1卷第8期上发表了《俄罗斯之政党》一文,郑振铎译。这是列宁《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的两种中译文,前者是译述,后者是摘译,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发表的列宁著作中译文。

在《曙光》杂志第1卷第6期上发表了《旧治更新》一文,全文翻译列宁的《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王统照译。在《曙光》杂志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过渡时代之经济》、《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大会蓝宁之演说》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全文翻译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署名WRK译。这是目前发现的在我国最早发表的全文翻译的三篇列宁著作中译文。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从1922年1月到1936年6月，北京地区共出版马列著作中译本6种9册，在报刊上发表中译文（包括文摘）20篇，其中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5篇（种），关于列宁著作10篇（种）。出版情况如下：

1. 《先驱》杂志1922年1月15日创刊号上发表《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重远译）和《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用的原则》（GS译）两篇文章，摘译马列著作片断。《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

2. 《今日》月刊从1922年2月到1923年8月发表《俄国现时经济的地位》（摩汉转译）、《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邝摩汉编译，分为三篇文章分别发表）、《哥达纲领批评》（熊得山译）、《马克思的诗》（二首，李湘涣译）、《历史以前底文化阶级、国家的起源、未开与文明》（熊得山译，分为三篇文章）等9篇，其中译出马克思著作3篇，恩格斯著作1篇，列宁著作1篇，除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评》全文翻译外，其他都摘译片断或者编译。《今日》月刊由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于1923年5月5日出版《哥达纲领批评》单行本，包括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给白拉克的信（1875年5月5日）、《德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哥达纲领》，书前有译者《小引》。这是目前发现的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在我国最早发表的中译文。

3. 《晨报》副刊在1922年2-3月、1933年3月发表《劳农俄国底建设事业》（象予译）、《马克思学说体系》（瑞麟译）、《马克思的自诉状》（瑞麟译）三篇文章，《劳农俄国底建设事业》是全文翻译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马克思学说》是节译